

孫逸仙富岡登陸記

王良

袁世凱懸賞二十萬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第二次革命時，在上海指揮大局的孫逸仙，和從廣州趕到上海的胡漢民一同返回出生地廣東，考慮重新建立革命根據地。同年八月二日，他們乘船由上海出發途中，抵達福建省馬尾時，日本駐福州領事館武官陸軍上校多賀宗之告稱：「廣東討袁軍已告失敗，廣東軍閥陳炯明逃走，甚為危險。」孫逸仙先生半信半疑的表示。多賀宗之又將報告廣東情勢的電報展示，請其相信，並勸其經由臺灣逃往日本。孫逸仙先生接受建議，和胡漢民一同前往臺灣。孫逸仙先生到達臺灣時，臺灣總督府派遣官員，嚴加警衛。孫逸仙住宿於臺北市御成町（現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的「梅屋敷」，為日本人所經營的旅社。孫逸仙先生還親自書寫「博愛」二字，贈送大和宗吉。「同仁」二字贈送藤井晤一郎。

「梅屋敷」舊址，即現在的「國父史蹟紀念館」。當時孫逸仙先生所使用的硯臺和家具，以及所書的「博愛」、「同仁」等現仍完全保存。當孫逸仙先生離開中國本土後，袁世凱下達命令：

誰能逮捕孫文，給賞金一千兩白銀，逐漸增加到一萬兩，最後竟增到二十萬兩。袁世凱僱用的刺客很多，如蜘蛛網一般分布各地。

潛渡臺灣再往日本

民國二年八月初孫逸仙先生離開臺灣，前往日本。搭乘「信濃輪」，於九日上午七時在神戶入港。袁世凱恐懼革命派再建成功，曾向日本政府、山本權兵衛首相提出「不准孫文登陸」的通牒。日本政府基於諸多因素和外交關係，接納袁世凱的要求。因此，在神戶港靠岸的「信濃輪」，即被警察臨時搜索。船長郡寬四郎迅速將孫逸仙先生藏於船長室隱密之處。對警察的搜查和新聞記者的追蹤，巧妙的應付過去。以後又靠玄洋社領袖頭山滿（當時被日本稱為國士，是對日本政治最有影響力人物）的協助，他特派前往神戶迎接的萱野長知和川崎造船所社長松方幸次郎均為孫先生的好友。又有大養毅的晚輩，在神戶市海岸大街從事海運業的三上豐夷等的幫助，孫先生方得秘密進入日本。

八月九日夜九時，正是黑暗時際，一艘小船靠近「信濃輪」，秘密將孫逸仙先生接往川崎造

船廠碼頭土岸。松方幸四郎親自步行接孫先生到神戶後山諏訪山溫泉常盤花園的別墅。孫先生隨後在藏身處會見了遲到數日的胡漢民和廖仲愷。經過大養毅、頭山滿兩人直接和山本權兵衛首相、牧野伸顯外相繼續交涉後，孫逸仙先生在日本的居留，方獲得默認。孫逸仙先生在神戶停留數天後，始計劃東京之行。

富岡登岸秘密號外

孫逸仙先生亡命日本時，於神奈川縣金澤區富岡地方登陸一事，為日本官憲秘密進行。當時情形，由神奈川縣知事大島久滿次在「一九二三年（民國二年、大正二年）八月十八日，向外務大臣牧野伸顯，送達的「秘密號外報告」中，可以了解一斑。

秘密號外報告

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八月十八日

神奈川縣知事大島久滿次

外務大臣牧野伸顯鈞鑒

為亡命者孫文到達入京事由

中國亡命者孫文，乘門司至橫濱的大阪商船公司貨物船「襟裳輪」，該輪自神戶和田岬通過

時，秘密上船，預定於昨十七日下午七時抵達橫濱。於橫濱檢疫停船兩小時前，改乘小汽艇，私自登陸，再乘汽車前往隱藏之處。一切經過，先後有外務大臣、兵庫縣知事，以電報通知在案，與本函有密切關係事項，於神戶已商談妥切。認為與十五日同京的國會議員古島一雄有再度洽商的必要。古島於歸京途中，經過平沼站。十六日下午四時，關於本函內情和立憲國民黨幹事前川虎造，一同出面到達縣廳，即時協商關於登陸地點和其他要務，一切均由古島議員全權處理。孫逸仙先生隱藏之處，為東京市赤坂區靈南坂二十六番地海妻氏私邸。並於夜黑之時，乘汽車到海妻氏住宅附近。以防洩漏本函所述內情。特備水上警察署所屬的小汽艇一艘，登陸地點為距市（橫濱）區稍遠的地方——富岡。並由逗子湖南汽車公司準備六人乘用的汽車一輛，各別分擔任務，以期萬無差錯。

當日下午五時，警察部長追隨水上警察署長同行（均着便服），與東京前來迎接的前川虎造、美和二人，共同乘水上警察署所屬的小汽艇，航行約三十分鐘左右，接近橫濱港界時，打開燈明浮標。約在一海哩海面，另有假做停船的「襟裳輪」在旁待命。按預定延遲二小時，即夜九時抵達，正當觀音崎方向。於幽暗中觀測，確認汽船的檣燈。當夜為陰天，烏雲遮月，遠處無法確認，於逐漸接近時，方可識別汽艇的燈光。慢慢鳴放汽笛，喚起對方的注意。對方以汽笛應答後，即向該船方向航行。到達能聽到聲音的距離時，詢問對方的船名，確認係該船時，橫濱水上警

察署「快進輪」向前迎接，命令其停船。「快進輪」靠近右側，「快進輪」船長請求汽艇將扶梯放下，引導轉登「快進輪」，於甲板上和孫逸仙先生會面，並續送孫逸仙先生至另一小汽艇。隨後二名中國人（廖、胡）和大型柳條包一個、皮箱三個、手提包一個移至「快進輪」。為保護孫逸仙先生，由神戶派來的神戶警察署員等均下船。此時恰為下午十時，其位置於燈明浮標東南約半海哩的本牧海面。即刻向登陸地點富岡方面開航，距富岡約二百公尺海面停泊。用預先準備的小舢板，分兩批載運上陸，再換乘僅離三四十步遠，停在金澤街道旁等候的汽車。

孫逸仙、前川、美和、神戶警察署員和本縣派遣的警察部長、警部一名計六人同行。預計下午十時三十分出發，趕往東京。登陸地點距離村落較遠，且為深夜，四週無人往來，不易被人發現的適當場所。汽車行駛途中，未遇任何阻礙，到達東京市赤坂區靈南坂附近時，於坂前下車，再步行到二十六番地，進入海妻氏私邸，此時為十八日上午零時四十分。

另外兩位中國人，連同行李等留在「快進輪」上（僅手提箱兩件放於汽車中），和菊池良一會合後，三人由海路向橫濱出發。「快進輪」於十八日上午零時十分抵達橫濱。「快進輪」返回大棧橋時，已知有東京朝日新聞社橫濱支社記者於水上警察署附近徘徊偵察。菊池良一和孫逸仙兩名隨行人員，盡可能避免被人發現。從「快進輪」登陸後，悄悄出發趕往東京。但時已深夜，汽車和火車均已停駛，不得已於當地停留一宿。

因此，以電話向市內太田町六丁目讚岐屋旅館連絡住宿事，並將讚岐屋主人找來，告知對住宿人應注意事項。十八日凌晨五時十分，乘第一班火車由橫濱出發。但難保無新聞記者追蹤，故未直接前往目的地，先進入其他人家。確定無人追蹤以後，再開始注意行動。一方於抵達前夜，向頭山滿先生報告，並請其注意等情。特此報告如上。

民意優容得道多助

一九一三年二月十八日的東京朝日新聞和二六新報刊載神戶特電：「孫文由和田岬乘KS輪，十七日夜向橫濱出發，當夜抵達橫濱港停船檢疫，再換乘小汽艇，於警察保護下，當日於橫濱市讚岐屋旅館投宿，翌晨入京」等記事。但各大新聞對孫文入京的路線不明而焦慮。尤其前記於讚岐屋投宿者，又和孫文本人相貌不同。另由神戶抵達橫濱後，改由陸路入京，其隨員乘「襟裳輪」入京等情，均係揣摩推測之說而已。本朝日新聞記者，雇用小船勘查沿岸登陸地點的情況等，至今仍嚴守秘密，均未向外洩漏。報告如左。

兵庫縣知事報告書

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八月十八日

兵庫縣知事 服部一二

外務大臣男爵牧野伸顯 鈞鑒

為孫文出發事由

既報孫文於本月十六日上午四時，及隨從二人，與由東京前來之菊池良一同行，於隱居處諏訪山常盤花園島田別墅，盤旋再三，乘預先備好

之汽艇出發，預定於和田海面靠岸，與來迎之汽船「襟裳輪」於途中相會，然後換船。同日上午七時，向橫濱出發，除與當地停留之宋嘉樹女兒宋慶齡、胡漢民會晤外，並未與其他中國人接觸。日本人除三上豐夷、萱野長知等，因有要務於此出入外，均未與任何人會晤，別無變化。報告如右。副本抄送內務大臣、警察總監、神奈川、福岡兩縣知事。

當時一般新聞的論點和觀察，正值袁世凱於全盛之際，有關保護亡命志士之對策，不可不謹嚴。但日本帝國政府之對象，必須為中國現實之權力中心。所以現在及將來，對袁世凱政府所應採取之方針，亦不因國策之不同，而影響外交之措施。帝國疆域雖狹，非不能容納亡命之志士。但政府以好意相待甚難，而人民之社交活動毫無妨礙。對中國政府可以友善，對亡命志士亦可以優遇。日本採取左右逢源之手段。刊登如此新聞者有之，並對孫文先生受如何之勞苦情形，亦於暗中注意。

親善協會建碑紀念

神奈川縣日華親善協會，為紀念孫逸仙先生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第二次革命之際，被袁世凱通緝，於避難途中，經由臺灣前來日本，於八月十七日在橫濱市金澤區富岡海岸登陸，故中日兩國有關人士計畫於登陸地點建碑紀念，由神奈川縣日華親善協會發起，經一年多時光的籌劃，方於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年、昭和五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在富岡慶珊寺前，

所建的「孫文先生上陸之地」紀念碑始告完成。揭幕式典之日，由國父孫逸仙之長孫，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孫治平暨國父日本老友鈴木久五郎之女加藤文子（文子之名為紀念孫文而取）剪綵，並由慶珊寺方丈佐伯隆定主持開光儀式；石碑為黑御影石，高二點七公尺、厚三十公分、寬一公尺。正面浮雕國父肖像，下為日本前首相岸信介所書之「孫文先生上陸之地」。

神奈川縣日華親善協會，雖早有建碑之計劃，因尚無確實之證據。但於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昭和五十八年）發現神奈川縣知事大島久滿次給外務大臣牧野伸顯的報告，獲得證實，方告具體化。由金澤病院院長富田裕擔任建碑委員會委員長，預定募集日幣一千萬元為目標，由於橫濱市民、橫濱市企業界以及全日本華僑的協助，於半年期間即募得將近一千五百萬日元，故能於預定日期（八月十七日，國父登陸七十一週年之日）揭幕。此次建碑之盡力最大者首推神奈川縣日華親善協會理事長，聖心女子大學名譽教授助野健太郎、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馬樹禮、橫濱支處長喬鍾洲等多位中日熱心人士。揭幕典禮時，馬樹禮代表親往觀禮並致詞。當日到有中日貴賓百餘人，其中橫濱華僑約佔三分之二以上。當日下午六時於橫濱東急大飯店舉行紀念酒會，情況更為熱烈。七十六年三月九日，為國父史蹟紀念館暨逸仙公園於臺北舉行重建落成典禮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馬樹禮曾說：「今天重建落成的國父史蹟紀念館，即是國父於民國二年八月，第二次到臺灣所居住的地方。」因此引

起筆者整理國父由臺灣抵達日本於富岡登陸的資料，完成「孫逸仙先生富岡登陸記」一文，並以此作為「國父史蹟紀念館暨逸仙公園」重建落成的紀念。

附「孫文先生上陸之地」紀念碑序文

序文
創立近代中國之父，提倡三民主義、大亞細亞主義者孫文先生，於第二次革命之際，被袁世凱放逐，逃出中國。經由臺灣亡命日本，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大正二年）八月十七日，由橫濱海面乘小舟，於當地富岡海岸登陸後，前往東京之史實，由當時神奈川縣知事大島久滿次，呈送外務大臣牧野伸顯之報告書中，獲得真象。孫文先生於富岡登陸能够成功，係靠當時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民之協助為其主因。要回憶近代中國之誕生歷史，與富岡登陸之事關係甚大。今次為顯揚上記史實與意義所建立之史蹟碑，為富岡居民之研究與多數日本人士之協力方告成功一事，即是兩國親善史上之金字塔。

昭和五十九年八月十七日
孫文先生上陸之地紀念碑建立委員會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合訂本及中外文庫、中外叢書，請撥電話五三六四二〇六，五三六五三一，即可收到書刊。